

民國秘史

轟動中外的間諜案

(上)

● 經盛鴻（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編者按）抗戰初期在南京替日本情報報的日本間諜黃濬（浚）字秋嶽，他因懷有不可告人之心，平時外表言行，常與他的隱衷極端相反，以期掩蔽真相，他的名字有多種寫法，黃濬、黃浚、黃秋嶽、黃秋岳，他在南京以漢奸罪被捕，正法時公布的名字是黃秋岳（見中外雜誌二十三號—五卷一期。馬五先生撰：汪精衛與黃秋岳），黃秋岳寫文章，作詩用的名字是黃濬（黃秋嶽）。

日本間諜因人廢書

一九八三年十月，上海古籍書店影印出版了一本引人注目的近代筆記著作《花隨人聖會摭憶》，約數十萬字，主要記述晚清與民國初年的人物史事，引用的資料雜採時人的文集、筆記、日記、書札、公牘、密電以及有關的一些外國人的著作，內容豐富，令人目不暇給，且情節曲折，文筆生動流暢，實為研究中國近代史難得的一本參考書，也是一本活潑有趣的文學著作，頗受讀者歡迎。

然而，此書已絕版多年，它的原稿在抗戰前曾逐條刊登雜誌，並經著名學者瞿兌之（清末軍機大臣瞿鴻禨之子）審閱，糾誤數則。但未及印行單行本而抗戰爆發，書的作者因日諜罪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淪陷前被國民政府槍決，此書在國民政府統治區遂成禁書。直到一九四三年，在日僑占領區有了印本。但抗戰勝利後即被取締。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後，在大陸也不得印行，祇在知識界有少數日僑時的印本在秘密流傳。

筆者曾認識北京大學一位專家。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千方百計地借到一本陳舊的《花隨人聖會摭憶》，竟花了一年時間將全書抄下。當時我不解地問他：「這樣有用的史料筆記與文學著作，出版社為何不出版？」他鄭重地告訴我：「因人廢書。因為這本書的作者在抗戰爆發前後墮落成日本間諜，他又擔任南京國民政府最高核心機構的機要秘書，出賣重要情報，危害極大，並多次企圖謀殺蔣介石，因案發被處極刑。作者是漢奸，此書就成禁品。」

這本書的作者就是抗戰初期在南京發生的轟動中外的日本間諜——黃浚（秋嶽）。

破案內幕十分曲折

一九八三年《花隨人聖會摭憶》被影印出版後，大陸著名作家兼學者舒蕪撰文稱贊說：「《花隨人聖會摭憶》的作者黃浚，字秋嶽，本是著名的舊體詩人，抗戰初期任南京政府行政院機要秘書，以勾通日寇、出賣重大國防情報的罪名，被公開處決，震動一時。其事究竟如何，後來沒再聽說有人為之翻案，也未有人再予以肯定，但是，他的《花隨人聖會摭憶》，讀書界一向很重視，其中晚清和民國初年的史料很豐富，談詩很內行，文筆也清雅可讀，但此書後來便不大容易找到了。上海書店於一九八三年十月影印出版，需要一些膽識，也是為讀書界做了一件有用的事。書中，對日寇侵略步步深入，民族抗戰呼聲日益高漲的時候，一再主和反戰，我看得不舒服，因此想到他的罪名成立並不冤枉。但除此以外，也有有見識的話，未可以人廢言。」（見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廿六日北京《光明日報》）

那麼，黃浚是怎樣一個人？他怎樣成為南京國民政府核心機構的機要秘書？又怎樣成為日本

的間諜？這一重大間諜案有怎樣的危害？又是怎樣破獲而轟動中外的？對此中内幕詳情，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由於黃浚被處決後不久，南京就淪陷於日軍之手，有關資料大多毀失，而當事者又多沒有留下回憶史料，因而隨著歲月的流逝，這段極重要的民國秘史快要湮沒無聞了，而街坊間的道聽塗說又多失實。

最近，筆者有幸見到了一位當年參與偵破此案的幸存者的回憶史料，又查閱了有關的各種檔案、報刊、回憶錄等，才掌握了此案的內幕與破案的曲折經過，今整理成文公之於世，供關心史事的讀者研究與指正。

核心人物親日媚日

黃浚，字秋嶽，福建省侯官（今福州）人。他早年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與後來擔任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是同班同學。在日數年，黃浚養成了濃重的親日、崇日、媚日思想。從日本留學回國後，黃浚長期在北洋軍閥控制的北京民國政府中任職，與北洋各要人及清朝遺老多有來往，十分熟悉清末民初政壇史事與掌故。黃浚又能詩善文，是民國初年文壇上十分活躍的舊式詩人，與曾擔任段祺瑞秘書長的梁鴻志名聲相當。此二人既是福建同鄉，又是詩壇盟友，而且都有濃重的親日傾向，因而私交甚篤，過從很密。黃浚後來正是以他熟悉的清末民初政壇與文壇史事寫成《花隨人聖盦憶憶》，給他帶來很大的聲名。

一九二八年北洋政府垮臺後，黃浚通過關係

，轉到南京國民政府中工作。不幾年時間，他就以其文才與縱橫捭闔、溜鬚拍馬的手段，獲得了國民政府中許多黨國要人的信任與賞識，尤為擔任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所鍾愛，不斷得到提拔，最後被任命為至關重要的行政院機要秘書，為簡任級，其地位僅次於行政院秘書長，得以能夠經常參加國民政府最高級的軍政會議，經常掌握國家各種最核心的機密。

黃浚成為國民政府核心中的人物，成為汪精衛與蔣介石身邊的紅人，可謂炙手可熱，飛黃騰達有時機。他的大兒子黃晟年方二十出頭，剛從日本留學歸國，就被他送進外交部任職。

但是，黃浚雖有才能，卻無人格。其父子生活豪奢，揮霍無度，在南京與上海都備有公館，經常往來兩地，燈紅酒綠，文物古玩，過紙醉金迷的生活，每月僅日常開支就達千元，薪資收入根本不敷所用。在政治傾向上，黃浚一貫親日，毫無民族感情與民族氣節。在三十年代初，日本先後發動了瀋陽「九一八」事變、上海「一二八」事變以及華北事變等，加緊侵略中國，中國各界民眾掀起抗日救亡熱潮。黃浚對中國人民抗日熱情十分反感。他利用職務之便，與日本來華的一些要人頻繁接觸，特別是與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因曾是早稻田大學的同學，更是打得火熱。

日總領事老牌間諜

黃浚的政治傾向、生活狀況、人品與愛好，尤其是他所擔負的極其重要與機密的工作，引起

了日本在華特務機關的高度重視。

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後，走上了軍國主義的侵略道路，以滅亡與侵占中國作為其重要國策，長期以來，對中國進行了範圍廣泛，無孔不入的間諜活動。「九一八」事變後，隨着日本侵華步伐的加劇，這種間諜活動更加瘋狂與露骨。形形色色的日本間諜，披着各種外衣，潛入中國各地，以各種手段與方法，刺探與竊取中國的政治、軍事、外交、經濟與文化情報特別是國防機密。南京是中國政府的首都與政治、軍事的中樞所在，自然成為日本間諜注目與活動的頭號目標。

南京地區的日本間諜大本營與指揮部是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因日本駐華大使館與其合署辦公，故簡稱日本使領館。日本使領館是一座現代化的花園洋房建築，樓房是日式結構，座落在南京市中心著名的鼓樓西南側的小山坡（名稱「百步坡」）上，與美國教會辦的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所在地）緊相毗鄰。總領事須磨早稻田大學畢業，有名的中國通，是個掛着高級外交官頭銜的日本老牌間諜。他到南京後，以外交官身分作掩護，指揮日本特務與浪人，收買中國漢奸與流氓，不擇手段地蒐集中國政府最高當局的核心機密，在神不知鬼不覺地製造了一起起震驚中外的事件。其中最為成功與影響最大的，就是他收買與指揮了以黃浚為首的漢奸間諜集團。

須磨與黃浚在早稻田大學同學，畢業後又與黃浚交往數十年，對黃浚的一切情況了如指掌。他利用黃浚的親日傾向與奢靡生活有目的地引誘，花巨額經費將其收買。

在重金收買與種種特權利誘下，卑劣的黃浚很快出賣人格與國格，墮落為可恥的漢奸與間諜。

糖與呢帽傳送機密

黃浚成爲須磨直接營養與指揮的日本間諜以後，不但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竊取中國政府最高當局的大量核心機密提供給須磨，而且還將自己的兒子黃晟拉下水，又用重金收買了國民政府中一些失意的親日派高級軍政人員，如參謀本部的曹高參、海軍部的李部員、軍政部的王秘書以及自己的汽車司機小王等參與其實國活動，充當向各方面蒐集情報的魔爪，共同組成了一個以黃浚爲頭子的漢奸日諜集團。

黃浚日諜集團對中國危害極大。因爲其成員都身居國民政府上層各軍政要職，隱藏極深，竊取與出賣的都是國家最重要的上層核心機密。這個集團又極其狡猾。他們活動隱蔽，與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聯係與提供情報的方法更是十分詭秘。

方法之一：黃浚親自出馬，經常以休息爲名獨身來到南京著名的玄武湖公園散步。他是以愛吃巧克力糖出名的。因此他每次到玄武湖公園時，總是帶着一包巧克力糖，邊散步邊吃糖。吃完糖他不將包糖的紙隨便亂扔，而是將包糖紙夾着一張預先寫好的情報，放到公園一株位處偏僻的大樹洞裏，然後走開。時隔不久，就有一個日本特務到此樹洞中將情報取走。因黃浚不可能經常到玄武湖公園散步，因此此方法不常用。

方法之二：黃浚定時到南京市中心新街口鬧市區一家外國人開辦的「國際咖啡館」裏去喝咖啡，吃點心，並且在每次進店就將自己的那頂深灰色呢帽掛到一根圓柱子上的衣帽鉤上，其呢帽夾層中密藏着情報。在這同時，必定早有一個日本特務也進這咖啡館喝咖啡，也將一頂同樣式樣的深灰色呢帽掛到衣帽鉤上，其呢帽夾層中密藏着須磨的指示。黃浚的呢帽與日本特務的呢帽緊緊并排掛在一起。但二人並不在一張桌子上喝咖啡，也互相不答理。然後那日本特務先喝完咖啡離館，卻在人們毫無知覺中將黃浚的呢帽戴上揚長而去。而黃浚則與任何人也不接觸，慢慢喝完咖啡，然後戴上剩下的那頂呢帽，不聲不響地走了。雙方的情報交換工作就這樣巧妙而動靜無聲地完成了：黃浚得到了日本總領事館的指示，而日本總領事館則得到了黃浚提供的各種情報。

封江泄密危害最大

後來，黃浚爲避免有人懷疑，他不再親自到那家國際咖啡館去，而是收買與指使他的汽車司機小王代替他，仍戴着那頂呢帽夾帶情報，定時到國際咖啡館去喝咖啡；而日本總領事館也經常更換聯絡人，派遣不同的特務人員到咖啡館，與小王交換情報。交換情報的方法不變。

黃浚集團的間諜活動順利地進行了很長時間，從未出現差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中日全面交戰。黃浚集團的情報搜集以及與須磨的秘密聯繫也加劇進行。於是，在中國抗日鬥爭中，出現了一個個觸目驚心的重大事件。

黃浚漢奸間諜集團不斷地將國民政府最高當局的軍政核心機密，提供給日本駐南京使領館。須磨得到這些極端重要的情報後，立即密電通知日本大本營。日本軍政當局迅速採取相應措施，給中國的抗日鬥爭造成極大危害。

影響最大的事件首推封鎖長江要塞泄密案。那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初。由於蘆溝橋事變後，北方戰事日益擴大，日本侵略軍企圖在控制華北後，直插山西、陝西、四川，從長江上游包抄國民政府的大後方。這是一個極其陰險而狠毒的策略。約在八月五日這天，國民政府最高當局蔣介石、汪精衛及軍委會的幾名最高軍事長官，召開了一次極端機密的最高軍事會議，決定針對日軍的戰略意圖，中國軍隊實施「以快制快」與「制勝機先」的軍事戰略，趁日軍主力集中華北之時，在八月中旬主動在上海發起進攻，率先殲滅日軍在上海的海軍陸戰隊與海軍艦艇，將戰爭引向東南淞滬一帶，並引起世界輿論的重視與西方列強的干涉；而在發動上海戰役之前，在八月上旬，先以海軍突然封鎖長江下游最狹窄的江陰要塞江面，一方面防止日艦從上海沿江西上進攻，另一方面攔截與獵獲當時正駛行或停泊在長江中上游南京、九江、武漢、宜昌直至重慶各港口的日方軍艦與商船，獲得戰略成果，並收先聲奪人之效。

這是當時中國最重大的國防軍事機密，除與會的蔣介石、汪精衛與幾名軍委會最高軍事長官以及擔任記錄的機要秘書黃浚外，任何人都不知

情。會議時間在八月五日。當夜，命令就以特級軍事機密下達有關部隊，其主要內容是：加強江陰要塞火力，以要塞火力與海軍艦艇封鎖江陰江面，破壞這一帶江面的航路標誌；在江面通道自行沉沒我方船隻與佈設水雷等。

日本軍艦連夜逃離

然而，就在蔣介石的命令剛下達到各有關部隊，封鎖江陰要塞長江江面的軍事行動即將實施之前，突然，在八月六日到七日，在長江中、上游沿線各港口南京、九江、武漢、宜昌、重慶間行駛與停泊的日本軍艦與商船，共約二十多艘，如襄陽、大福、瑞陽、大利、鳳陽、吉和、大貞、南陽、宜陽、大昌、嶽陽、信陽、大亨、當陽、湘江、沅江、武陵、大吉、長湯、嘉陵、涪陵、雲陽等輪，均於極短時間內，全都昇火飛速下駛，撤往長江下游，奮力衝過江陰江面。在重慶、武漢、南京一帶的日本僑民也都突然停止一切工作與活動，隨日船撤離。事後人們發現，日僑在匆忙撤離時，連許多貴重物品都來不及攜帶，甚至有的地方茶飯都已擺到桌上而來不及動筷，就匆匆上船逃走。等到中國海軍艦艇奉命趕到江陰江面攔截時，僅阻截與擄獲到「嶽陽號」(3,290噸)與「大貞號」(1,369噸)兩艘日本商船。後來，中國軍方將這兩艘船上的日本僑民與外交人員、海員等一起押解抵南京，再從浦口搭乘火車、經濟南轉青島，釋放回日本。

封鎖江陰要塞長江的軍事計畫未及實施便宣告失敗了。很明顯，日本大本營在中國最高當局

作出這一決策後數小時內就迅速獲得了這一重大軍事情報，並立即作出反應。日本間諜的魔爪無疑已伸進了國民政府最高軍政核心內部。

這魔爪就是黃浚日諜集團。

蔣委員長逃過一劫

在封鎖江陰要塞長江泄密案發生的前後，南京國民政府還發生了多起重天泄密案，並幾乎釀成了極其危險的後果。

其中最為觸目驚心的是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所乘汽車在滬寧公路上，遭到日軍飛機有目的的轟炸掃射，許閣森負重傷，而蔣介石也幾乎遇難的事件。

那是在八月十三日上海爆發戰爭以後。戰事越來越激烈。作為國民政府最高軍事統帥的蔣介石多次想親自到上海前線視察，但寧滬鐵路與公路均被日軍嚴密封鎖，日夜狂轟爛炸，蔣介石無論乘火車或汽車都極不安全。約在八月廿五日，在一次高層軍事會議上，新任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向蔣介石建議說：

「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明天因事要從南京到上海去。你可以乘坐他的汽車去。英國在中日戰爭中是中立國，其座車上覆蓋英國國旗，有明顯的英國標誌，可免日機轟炸。」

蔣對白的建議當場表示首肯，並派人與許閣森聯繫。

然而，到了第二天，即八月廿六日，蔣介石因急事纏身，臨時中止了乘許閣森汽車去滬。結果，許閣森的汽車開上寧滬公路後，於當日下午

二時許，在嘉定地段遭到兩架日機的有目的的攔截與瘋狂的掃射轟炸。盡管許閣森汽車頂上覆蓋著大幅英國國旗也無濟於事。許閣森汽車左躲右避，最終還是被炸翻，許閣森大使被機槍子彈擊中，脊骨受傷，肝部中彈，生命垂危，被送往醫院急救。若蔣介石那天也乘坐此車，定難逃過此劫。

有意挑釁假意道歉

此事發生後，英國政府向日本提出外交抗議，中外各報以大字標題連日報導，前後鬧騰了一個多月。日本方面作賊心虛，一方面派人到英使館表示道歉遺憾，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到醫院探視許閣森；另一方面又詭稱許閣森汽車上的英國標誌太小，日機無法辨清以至誤傷。

日方的詭辯是各方面都不相信的。因為許閣森汽車被襲擊地段遠離上海戰區，日機俯衝時距地面僅十來米高，當時此地別無他車，許大使專車上不僅覆蓋大幅英國國旗，車頭也插有英國國旗，前後與日機周旋多時，日機不可能辨不清是英國汽車，日機顯然是有意挑釁與傷害。

中國政府情報機關與最高當局更是十分清楚：日軍飛機之所以不惜冒犯國際公法與開罪英國而襲擊許閣森專車，絕不是為著打死許閣森。他們是為著達到更為重要的戰略目標——襲擊與炸死蔣介石。他們顯然已預先得到情報，知道許閣森的專車在這天將搭載蔣介石赴滬。他們是衝著蔣介石來的。

然而，蔣介石決定乘許閣森的座車去滬是在

出事前的一天會議上作出的。出席這次會議的只有最高層的幾位軍政長官與機要秘書黃浚。是誰將這重大機密情報如此快速準確地提供給日本間諜機關的呢？

混入軍校企圖行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許閣森座車遇炸後不久，又發生了一起中央軍校逃軍案：日本間諜的危言聳聽再次直接指向蔣介石。

南京中央軍校是國民政府所轄的最重要也是

規模最大的軍事學校，座落在南京城東黃埔路。

蔣介石對該校特別重視，自兼該校校長。他在南京時，十有八九是住在軍校內的「校長官邸」中，中央軍校每次舉行「總理紀念週」時，蔣介石都要參加並親自主持，還常常對師生進行「精神訓話」。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因軍政事務繁忙，才不經常參加軍校的「總理紀念週」。

一九三七年八月底的一天，蔣介石突然指示中央軍校舉行一次「擴大總理紀念週」，不僅中央軍校的全體師生要參加，而且陸軍大學的全體師生以及黨、政、軍各部長官都要參加。蔣介石

決定那天他將親自到會並作重要講話。

「擴大總理紀念週」的那天到來了。中央軍校與陸軍大學的師生首先來到會場，把隊列站得整整齊齊。中央軍校學生總隊的隊長惠濟擔任大會總值日官。中央黨、政、軍各部的大員也先後乘車來到中央軍校，小轎車一輛接一輛開進了軍校大門。

由於這天蔣介石與許多軍政大員到場，軍警憲特機關加強了對中央軍校的警衛工作，在從中山東路折進黃埔路的一路上，直到軍校大門，軍警密佈，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軍校內部則有大量便衣特工人員巡查；進校的汽車都由在校門口值勤的憲兵登記車號與人員後，才准予放行。

正當與會人員列隊整齊靜候蔣介石蒞會時，

忽然總值日官惠濟向大家宣布：發覺有兩名嫌疑人員混入軍校，正在進行搜查。會場上引起了一陣騷動，但很快便安靜下來。不一會有人報告，那兩名嫌疑人員發覺被人注意，已在混亂中乘坐一輛轎車逃走了。事後，軍警機關進行調查，判斷那兩名嫌疑人員極可能是日本特務，他們潛入軍校混入「擴大紀念週」會場，其目的無疑是企圖竊取情報與刺殺蔣介石等軍政大員，但因進入軍校後即被軍警發覺，故又乘車倉惶逃走。軍警機關從清查校門登記的進出轎車與人員，發現那兩名嫌疑人員乘坐逃走的轎車，竟是行政院機要秘書黃浚的專車。而且，那兩名日本間諜是怎麼事前就知道這天中央軍校要舉行「擴大總理紀念週」，並且蔣介石還要出席？是誰向他提供了這一情報的呢？（下期續完）

抗戰前後的外諜內奸

陳劍秋

抗戰前後日本軍閥禍國禍華，日本軍閥掌控日本內閣，以政治的高壓手段，進行經濟侵略剝削中國，更用武力攻城掠地，同時布置間諜，竊取機密，並進行勾引內奸，製造傀儡偽組織，出賣國家民族。

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國之後，全民渴望統一，日本深恐中國統一強大，因之處心積慮，先後派遣大批特務人員來華，挑撥離間，煽動製造中國內部動亂，以便蠶食我國，同時利用特務活動製造傀儡政權，與國民政府相抗衡，這些外諜內奸成爲我國潛在的巨大禍患。

從九一八到七七全面抗戰爆發，這段期間，日本在華活動的國際間諜有：田中義一、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須磨、松井石根、畑俊六、岡村寧次；等，這些從事侵華的間諜人物，他們指揮帶領日本國內長期訓練過的地下工作人員，在中國各地從事滲透工作，更在我們國內收買一些心志不堅，見利忘義的不肖之徒，竊取國防機密，作日本間諜的走狗，作出賣中華民族利益的大漢奸。抗戰初期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機要秘書的黃浚，就是當時的頭號大漢奸。黃浚是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在早稻田大學的同班同學，須磨受土肥原的指揮，由於須磨的中介，土肥原在黃浚手中得到了不少情報，所幸法網恢恢，疏而不漏，黃浚終於受到國法的制裁。

本刊隆重刊出轟動中外的間諜案時，附帶刊出日本在華間諜的圖照，供中外讀者一睹日本國際間諜的廬山真面目。